

龙冈大捷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决胜之战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主战场，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的龙冈。龙冈大捷，我军活捉敌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震惊中外。

大军压境诱敌深入

1930年10月初，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宣告结束，这标志着军阀混战告一段落。此时，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全国的苏区和红军，并把朱毛红军作为“围剿”的重点。蒋介石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围剿”总司令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进入江西境内的敌军。11月初，鲁涤平将7个师另1个旅共十万之众，组成3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张辉瓒，指挥第18、第24、新编第13师等3个师，位于樟树、丰城一带；第二纵队司令谭道源，指挥第50师和独立第14旅，位于南昌及靖安一线；第三纵队司令罗卓英，指挥第77师、新编第5师和第8师，位于上高、高安等地。鲁涤平采取“并进长追，分进合击”的策略，妄图把红军消灭在樟树到分宜段的袁水流域。

如何应对十万敌军，这是摆在所有红军指挥员面前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从10月25日开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罗坊召开联席会议，集中讨论红军的战略问题。在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夹江而阵”还是“诱敌深入”的策略发生激烈争论，直至29日深夜，会议仍然未达成共识。10月30日，红军总部获悉敌军已倾巢而出，毛泽东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最终通过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是一个弥足珍贵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抉择。这表明红一方面军就此摆脱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束缚，而且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由山地游击战向更为广阔的农村腹地运动游击战转变迈出了关键一步。

运筹帷幄慎重初战

11月5日开始，红一方面军和红三军团分别在峡江巴邱和仁和一带东渡赣江进行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退到苏区腹地宁都黄陂、小布后，毛泽东于12月上旬在黄陂中排村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积极落实会议精神，进行紧急动员，组织群众投入反“围剿”工作。12月25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河滩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题写的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高度概括了红军的战略战术。这既是一场誓师大会，又是一次政治动员大会，会后军民摩拳擦掌。

为了慎重初战，毛泽东同朱德等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认为：一方面，敌军虽号称十万之众，但均非蒋之嫡系，其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而且战线过长；同时，张、谭两师是客军，且飞扬跋扈，骄兵必败。另一方面，张、谭两师各有1万余人，而红一方面军有4万余众，还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因此，一次消灭敌一个师有相当把握，如果摧毁了这一师，反“围剿”就势如破竹。红军总部决定将张辉瓒、谭道源两师作为初战的打击对象。

12月28日，红军主力转移到永丰埠垅后，侦察到张辉瓒师有进攻龙冈迹象。29日，张辉瓒以第54旅留守东固，率师部和第52、53旅进犯龙冈。毛泽东、朱德等于29日晚上，在埠垅万寿宫召开军事会议，发出红一方面军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下达作战部署。

协同作战生擒敌酋

30日凌晨，毛泽东与朱德打着火把，冒着浓雾登上海拔400多米高的黄竹岭小别山指挥所。早上7时，张辉瓒师以第52旅黄团前锋，其后是李团，第53旅陈团跟进，朱团作后卫。8时许，当黄团行至距龙冈东南6公里的小别拱桥时，与西进的红3军第7师遭遇，打响了龙冈之战的第一枪。敌人向红军猛扑，红7师奋勇反击。红3军军长黄公略令红8师和红9师从左右两侧包抄。敌52旅旅长戴岳令李团也进入阵地，逐步向我攻击。敌凭借武器优势，极力阻止红3军向龙冈方向前进，战斗一时处于胶着状态。黄公略派人上黄竹岭指挥所报告情况，要求增兵。鉴于总部警卫营都已上前线，一时无兵可派，朱德决定“无兵派将”，将参谋处长郭化若派往红3军协助指挥，鼓舞士气。

战斗打响后，永丰共有一万多名赤卫队、少先队同主力红军并肩战斗在第一线。战斗到当天中午，罗炳辉率红12军突然从敌左侧向敌第52旅发起攻击，战斗开始变化。戴岳急电张辉瓒求援。张一面孤注一掷，亲自指挥4个团向我军多路猛攻，一面电令在东固的第54旅驰援。敌人的多次猛攻被我军击退，援军由于被我地方部队阻击，未能赶到。

下午3时许，正当激战正酣之时，红4军、红3军团一部从北面高山上猛冲下来插入张家车，切断了敌军退路，从背后向龙冈之敌发起猛烈攻击，第18师的两个旅就成了红军待宰的“羔羊”。下午4时左右，朱德发起总攻令，顿时枪炮齐鸣，杀声震天。张辉瓒师集中火力进行垂死挣扎，企图向万功山逃窜。罗炳辉立即组织火力堵截。要裕指挥红64师同红34师相互配合，把敌人压向河边。很快，红旗胜利插上了万功山顶。红三军在红四军第11师配合下，迅速向城功村出击，捣毁了万氏宗祠里的敌部师部。红10师迅速占领隔壁的关公庙，俘虏了全体电讯人员。

龙冈一战共歼敌9000多人，缴获各种武

器近万件，电台一部，子弹100万余发。师长张辉瓒化装逃往万功山，藏匿于一个小山洞之中，在红军打扫战场时被活捉。活捉张辉瓒的喜讯飞快传遍龙冈，军民奔走相告。毛泽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龙冈大捷后，红军乘胜追击，于1931年1月2日和3日，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半个师，俘官兵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红军在5天内两战皆捷，歼敌1.5万余人。鉴于败局已定，作为“围剿”总司令的鲁涤平只得两次下令收兵。这样，国民党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以惨败告终。龙冈大捷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决胜之战，也是中央苏区和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奠基之战，保护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胜利果实。

非核爆炸忆,得克萨斯城港硝酸铵事件

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美国得克萨斯港口的硝酸铵大爆炸，不仅摧毁了得克萨斯城，造成了数千人的伤亡和上亿美元的财产损失，还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是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工业事故，被列为全球最悲惨的10大工业爆炸事件之一。同时，这次严重的大爆炸事件也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非核爆炸”。

一支随意丢弃的烟头，引发的一次非核爆炸

1947年4月16日，得克萨斯城的居民面临了一场空前灾难。自20世纪初得克萨斯州发现大量石油以来，这里就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石油工业基地之一，而得克萨斯城则是一个重要石油运输枢纽。当天，一艘名为“Grandcamp”号的法国籍自由轮，正停靠在美国加尔维斯顿湾得克萨斯城港口，此时这艘重7176吨、长437英尺的货船上，已装载了2300吨硝酸铵。

不料，一名船员无意间将一支未燃灭的烟头扔进“Grandcamp”号的货舱内，后燃起了熊熊大火。船员们为了保证硝酸铵的安全，选择采用“窒息法”灭火，结果弄巧成拙造成船舱集高温和高压为一体，成为一个密闭的硝酸铵爆炸反应容器……

据不完全统计表明，在这次爆炸中大约有600人丧生，3500多人受伤，1100艘船被毁。由于爆炸引起的烈火更是焚烧了三天三夜，让2/3的街区成为废墟，3/4的化工企业被葬送。

同样被连锁反应波及到的，还有一艘装载着1000吨硝酸铵和2000吨硫黄的“High Flyer”号货轮，发生了二次爆炸，被牵连的还有附近的工厂、货轮、围观者……接连不断的灾情最终造成当时的繁荣之都、工业城市得克萨斯损失了约1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亿多美元）。

大爆炸使得克萨斯城港灾难不断并引发生态灾难

因一支未燃灭的烟头引起的硝酸铵大爆炸，所产生的大量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形成了高达600米的橙色蘑菇云，扩散至得克萨斯城及周边海域，并造成5公里区域内的建筑、石油库等发生持续火灾，致使附近十几公里的区域被黑色油雾笼罩。

持续的大火致使大量野生动物丧生，造成大面积的森林、植被被烧毁。几千吨的硝酸铵和硫黄等燃烧爆炸，产生大量的氮氧化合物和二氧化硫等在高空形成酸雨，导致该地区土壤酸化、贫瘠。数万桶石油、苯乙烯等燃烧产生的有毒物质，扩散至十几公里以外的区域，影响着水生生物的生长、繁殖或导致其死亡，造成附近海洋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长期威胁海洋生态环境。

同时，部分化学物质覆盖在海洋底栖生物或沉降到海底，通过食物链在动植物体内富集，威胁动植物的生存，或者形成毒性更强的化学物质，危害海洋生态安全。由于得克萨斯城港口化工企业过于集中，船只停靠距离较近，在两天内引发多次连锁大爆炸。大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引发了高达4.5米的灾害性海啸，得克萨斯城再次面临严重的生态灾难。

硝酸铵大爆炸事件带来的警示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生事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科技与历史不会因为一些事故而停止发展。得克萨斯城港大爆炸，作为人类历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硝酸铵爆炸事件之一，我们应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提升危化品生产环境的应急处置能力。应急处置能力是预防、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事件，减少次生环境灾害，保障危化品生产、运输、存储等全过程安全的重要内容。一是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实战性的应急预案。通过管理部门与化工园区、物流和仓储所在企业的联防联控，建立完善危化品应急预案体系，特别是构建应对极端天气和巨灾情景的专项应急预案，定期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二是做好危化品的应急储备和物资保障。加强安全防范的重点部位和区域的应急物资储备，包括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等工作，对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及时配备溢油控制清除、消防灭火、防护探测等设备，建设危化品封堵、阻燃、清除等设施。三是强化应急救援人才队伍建设。加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专业性应急救援队伍，鼓励社会、企业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建立完善应急专家库，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危化品处置等类别应急处置专家队伍建设。

关注“今日灌云”微信公众号 掌上阅读《灌云报》



了以民为本、爱民乐民核心理念，而且在实践中处处彰显着惠民、利民、养民的政治操行。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次，齐景公为了扩大晏婴的住宅条件，借晏婴出使鲁国之际，把晏婴邻居的住宅拆了，晏婴得知后说，为了扩大自己的住宅而侵犯邻居的利益，违背民心。晏婴坚决不居住，并恢复邻居原来的住宅，奉守不损害百姓利益的准则。

以民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百姓的物质需求——粮食，这在农耕时代尤其如此。而要满足百姓的粮食需要，关键在于保障不误农时。据《晏子春秋》记载，在农收时节，齐景公为追求逸乐，役使大批民工兴建长康台。有一次恰逢齐景公举办大型宴罢，晏婴虽在旁边陪侍，但心里始终牵挂着无法回家收获的民工。当酒过三巡时，晏婴离开席位，边舞边唱道：庄稼结穗而不能收获，秋风吹来全部凋落，风吹雨打全部飘散，上天无情，不让民活。晏婴唱完，悄然泪下。酒酣耳熟的齐景公明白了晏婴的深意，于是下令停止工程，民工得以回家收粮。

廉洁清正为政以德

廉者，政之本也。官德是为政者最基本的品格要求和道德规范，体现了为官者道德修养的主体自觉和慎独的自律极致，与治世安邦息息相关。《晏子春秋》所蕴含的廉洁清正、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以以德治吏、良吏治国为主线。

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官德呢？齐景公与晏婴关于社稷之臣、善为国家等问答，折射出晏婴对这一问题的独到思考。齐景公问晏子，对于国君而言需要什么样的臣子？晏婴答曰：所谓国家大臣，就是能够稳固国家，分清君臣上下之礼。齐景公又问，如果发现治国的贤人名士呢？晏婴答曰：评判贤人名士，要通过观察他的行为作出评价，而不是根据华丽的言辞作出判断。

晏婴在作为期间，始终以廉洁清正为本，心怀清正廉洁之心，坚守道德情操，不随波逐流，是讲官德、重官德、守官德的楷模。齐国相国庆封由于专权遭到众大夫的攻击而逃亡，人们瓜分他的财产并提议把卿殿分给晏婴作食邑。晏婴坚决不接受，认为人人都想生活充裕，但对财富既不能废弃减损，也不能任意无度。在他告老还乡时，主动提出要把封邑还给齐景公，齐景公认为这没有先例，不同意晏子的提议。晏婴说，品德厚重而接受俸禄，是为了体现主上的圣明；品德微薄而退还俸禄，是为了使臣下廉洁。在晏婴看来，自己年老德薄主动把封邑退还给齐景公，这是他廉洁清正的表現。

俭以养德躬行节俭

齐国建国之初，特别是到齐桓公时期，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改革举措，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然而，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齐国的奢靡腐化之风也开始盛行，到齐景公时期尤为如此。《晏子春秋》不仅多处论述了齐景公嗜酒崇乐、华衣美食、大兴土木的奢靡生活，而且贯穿着晏婴对俭以养德的清醒认识。

晏婴认为，只有君主约束自己、节俭为政，才能减轻百姓负担，赢得民心。面对齐景公奢为宫室、广为台榭、丰乐侈游与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形成的鲜明对比，晏婴极力劝谏齐景公厉行节俭。据《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问晏婴：我想登上圣贤之王的服饰，居住圣贤之王的房子，这样各国诸侯会来归附吗？晏婴答道：效法他们的节俭是可以的，如果只是效法他们的服饰房子，就没什么好处。齐景公又问晏婴，作为君王，身份尊贵百姓安定，这样困难呢，还是容易？晏婴回答说，作为君王，节制自己日常的开支，其余的用以照顾百姓，这样就自身尊贵而且百姓安定。

晏婴在劝谏齐景公的同时，更是身体力行、躬行一生。据《晏子春秋》记载，作为相国，晏婴吃的是粗粮淡饭，菜肴也比较简单平常，连齐景公都感到过意不去。晏婴却不以为意，觉得不仅能吃饱肚子，还能有荤菜、素菜的搭配，已经很满足了。他一再婉拒齐景公赐予的封邑、千金、狐裘、宅第、市租、乘马等，成为百官表率。

节俭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先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认识到勤俭是持家兴业的根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分工的细化、国家的出现，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亦提倡节俭的理念，这种理念的提倡和推广，对于净化社会风气、重塑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作用。

勤俭治家

古代循吏多数都坚持以节俭为原则治家持家。范仲淹父亲早亡，在其两岁的时候，随母亲改嫁到朱姓人家，生活非常困苦。艰苦条件培养了他崇高的志向和勤俭的作风。后来他回忆这段清贫生活，用一句诗来概括：“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商角徵。”他走上仕途后，仍然以严格的节俭精神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在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想回苏州老家一趟，下属看他积蓄不够，就要为他筹措路费，却被他断然拒绝。他看到儿孙们穿着朴素，非常高兴，但仍不忘告诫儿孙：“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亦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范仲淹治理家极严，对于可能出现的危害家风的事件都要提出严厉批评。他的儿子范纯仁娶了

朝廷重臣王质的长女，儿媳在娘家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来到范家后，不适应俭朴清贫的生活。当范仲淹看到儿媳从娘家拿来上好的丝绸做帐幔时，就严厉批评儿子和儿媳：“罗绮非帷幔之物，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此后，范仲淹儿媳逐渐改变了先前的生活习惯，与范纯仁一起过上了清贫的日子。范仲淹去世后，家中没有余财，以至于“殆无新衣”，只能靠朋友筹钱以奉葬。他的儿子范纯仁继承了其父勤俭的家风，从布衣一直做到宰相高位，始终不改清廉之风，《宋史》评价其“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范纯仁提倡的“惟俭可以取廉”铸就了他一代名臣的风范。

力矫时弊

古代循吏更为矫正奢华的不良社会习气，一般都要力倡节俭。在司马光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物质繁荣的时期，士大夫争于奢侈。官员家中设宴，如果没有皇官酿造的酒、没有从远方采购的珍奇果蔬、饭菜的种类不够繁多、器皿上不摆满食物的话，都不好意思招待客人，因为担心被讥讽。差役穿得像士大夫，农民穿丝绸做成的鞋子，不同阶层的人都纷纷追求物质享受，奢华的社会风气日益浓厚。为了矫正这种不良的社会习气，司马光用文章陈明观点，深入浅出地提倡节俭精神，并身体力行，以矫时弊。司马光一生极为节俭，从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中可以看出，他所用稿纸都是用过的，经常将淡墨的字迹涂掉后继续当新纸使用。当时，别人讥笑他寒酸，但他仍以节俭为美德，乐之如故。他在《训俭示康》中告诫儿女，自己是“寒族”出身，“吾本寒家，士以清白相承”，并引述孔子“与其不逊也宁固”的节俭思想，还讲述李沆的事作为范例——李沆任宰相之时，修建的住宅太过狭窄而遭到门人议论，但李沆回答说，这已经很阔绰了，司马光讲述此事，是为了说明高明的人是从精神层面认可节俭的。

始终如一

古代循吏更为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一般都能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曹操出生于富贵之家，从小衣食无忧，但他却能严谨自律。当时，北方经济发展缓慢，物资储备不丰，民生改善乏力，曹操于是力主节俭并身体力行。他自己的几件衣服已经穿了10多年，但每年都要对这些衣服进行缝补，以备继续穿用。“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巾，以黄布缘中。遇乱事无韦巾，乃更作方竹严具，以皂韦衣之，粗皮作巾，此孤之平常所用者也。”曹操的这段话成为他带头倡行节俭的真实写照。他还用这种节俭精神勉励家人和下属。他在家书《内戒令》中告诫家人不得燃香：“昔天卜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然诸女配国家，因此得烧香。吾不烧香，恨不遂初禁，令复禁不得烧香。其所藏衣，香著身亦不得。”当时，燃香是用香料改善身心身体的一种办法，是贵族的一种生活习惯，是奢侈生活的体现。作为一方权要，曹操能够厉行俭朴精神，告诫家人禁止燃香，可见其重视节俭的力度。

古代循吏将节俭的理念渗透到自己的生活中，使之成为一种纪律要求和生活习惯。《周易》中说，“用过乎俭”，强调一种用度节俭的生活习惯。汉朝名臣朱博生活非常节俭，“不好酒色游宴”，身份地位逐渐升高，但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直不变，“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一生守俭如一。汉朝名臣王良，在为官期间，“在位恭俭”。在他做大司徒司直时，属下的司徒史鲍恢因为要到东海办事，路过王良家，就顺便到他家问候，看是否有家书托自己带给王良，正遇王良的妻子穿着麻布衣裤，拖曳着柴禾从田地里回来。鲍恢问她：“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她回答：“妾是也。苦稼，无书。”鲍恢没有想到堂堂王良大人的妻子竟然穿着如此简朴，但也心生敬佩之意，从中间见王家节俭之风。朱博和王良将节俭之风化为自己的生活常态，成为时人学习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

1927年4月27日，王复元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会后，中央让他带回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1000元，而王复元谎称巨款在途中被窃，竟将这笔巨款据为己有。随后，王复元利用担任山东党组织重要职务之便，多次贪污公款。1928年4月，他辞去上海与党组织联系工作为由，从直属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印刷部的集成石印局拿走2000元资金，而当时石印局承担印刷山东党内刊物《红星》及党的文件与宣传材料的重任，最终石印局因经济困难而被迫停业。

王复元贪污党费的丑事，被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及时发现，邓恩铭对他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早在1926年8月，中央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也是中共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专门性文件。通告说：“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形。”“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留情地清理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依据中央的文件，邓恩铭将王复元开除出党，邓恩铭成了中共历史上反贪第一人。王复元也成为中共历史上因贪污而被开除出党的第一人。